

DOI:10.19834/j.cnki.yjsjy2011.2026.02.02 CSTR:32289.14.yjsjy2011.2026.02.02

# “十五五”时期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时代诉求、现实基础与推进策略

郑刚,付延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武汉 430079)

**摘要:**“十五五”时期,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承载着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国使命,适应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创新需求,契合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研究生教育体系的改革要求。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培养规模持续扩大,学科体系日臻完善,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分类发展格局初步形成,综合改革不断深化。但是,目前研究生教育还存在学术型与应用型研究生培养同质化、学科专业设置不能充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亟待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效能有待提升等若干问题。面向“十五五”发展新阶段,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化分类培养改革,健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完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机制,从而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注入持久动力。

**关键词:**“十五五”时期;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1663(2026)02-0009-08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阶段,也是推动我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跨越的攻坚期。作为教育体系的高阶形态与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构成,研究生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占据战略制高点,其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核心竞争力提升与现代化建设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sup>[1]</sup>。这个定位凸显了研究生教育在造就高层次创新人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驱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关键使命,也使其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与发展潜能的重要标志。在“十五五”时期,加快推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不仅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举措,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已在扩大规模、完善学科体系与促进分类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

绩,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研究生教育仍面临若干深层挑战,包括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培养模式趋同、学科结构动态调整滞后、拔尖创新人才供给不足、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效率偏低等。这些结构性矛盾制约了研究生教育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整体效能。在此背景下,本研究立足于“十五五”规划的战略视角,系统阐释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诉求与现实基础,深入剖析当前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提出相应的推进策略,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提供学理依据与实践参照。

## 一、“十五五”时期研究生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诉求

### (一)强国诉求: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绝非教育系统的“内部

收稿日期:2025-12-31

**作者简介:**郑刚(1976—),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付延(1997—),男,河北唐山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关于教育工作重要论述的思想体系研究”(19XKX0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数智时代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实践路径与优化策略”(XJ2025GY50)

事务”,而是深度嵌入中国式现代化宏大进程的系统工程。《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sup>[2]</sup>。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最佳结合部的研究生教育,必须承担起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与战略重任。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场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文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sup>[3]</sup>。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破解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瓶颈,迫切需要研究生教育输送更多能够立足世界科技前沿、致力于核心技术突破的拔尖创新人才。这个国家战略导向,不仅为研究生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也为其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资源保障与政策支持。在新的历史方位下,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服务国家需求为根本遵循,紧密围绕重大发展战略与现实挑战,精准对接国家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结构性与战略性需要,系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体系,为国家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的持续提升提供坚实支撑<sup>[4]</sup>。这既是时代赋予研究生教育的历史责任,也是其实现内涵式发展的战略机遇。

## (二) 创新诉求:适应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

在全球创新版图重构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深刻重塑着知识生产方式和人才培养范式。当今世界,学科前沿的重大突破、原创性重大科研成果的产生、新兴学科增长点的培育以及优势学科方向的凝练,大多是多学科交叉、融合和汇聚的结果<sup>[5]</sup>。传统单一学科的知识生产范式,已难以回应日益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时代发展要求研究生教育必须打破学科壁垒,大力推动深度交叉融合,形成跨学科研究和交叉融合的新范式。这意味着学科布局、导师团队以及科研组织方式均需进行适应性调整。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蓬勃发展,对人才的知识结构、创新能力、实践素养也提出了全新要求。《“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sup>[3]</sup>。当前,我国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来自产业端与市场端的现实需求,倒逼研究生教育在专

业结构、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等方面作出全面调整。同时,以人工智能等数智化技术和手段驱动研究生教育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正在成为世界性议题<sup>[6]</sup>。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可替代大量程序性、重复性脑力劳动的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必须实现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塑造”的根本转变,着力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创造性思维以及情感智能等核心素养的高层次人才。总之,这种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育转型,不仅是应对技术变革的必然选择,更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

## (三) 变革诉求: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

我国研究生教育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从外延发展向内涵建设转型的关键阶段。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既是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的客观需要,也是教育系统实现自我革新、主动塑造发展新动能的内在要求。这个变革的核心,在于建立一个能够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有效支撑国家战略需求并在全球高等教育竞争中赢得主动的研究生教育体系。该体系的鲜明特征在于“中国特色”。“新时代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典型的中国背景,是对中国研究生教育经验的总结和时代现状的反映<sup>[7]</sup>。这意味着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必须扎根中国大地,遵循教育规律,紧密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将服务国家作为最高追求,培养既有全球竞争力,又深怀家国情怀、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时代新人。另外,这个体系必须是“高质量”的。高质量绝非单一的论文指标或就业率所能代表,它是一个涵盖结构、过程、结果和贡献度的多维概念。它要求学科专业结构能够前瞻响应甚至引领产业变革,培养过程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和批判性思维,培养结果应体现为毕业生具备扎实的学识、卓越的能力和高尚的品格,评价标准应聚焦于研究生教育对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的实际贡献。总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要求我们以更大的决心和智慧,推动教育理念、学科结构、治理机制、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系统性变革,构建起一个能够自主培育一流人才、持续产出一流成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且充满活力与韧性的研究生教育新生态。

## 二、“十五五”时期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及问题

### (一)“十五五”时期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

#### 1. 研究生教育总体规模实现跃升

研究生教育规模既是一个国家人力资本储备与知识创新潜力的重要表征,也是揭示一个国家创新力与竞争力的重要指标<sup>[8]</sup>。经过数十年的持续努力,我国研究生教育总体规模已实现了从“凤毛麟角”到“百万大军”的历史性跃升,跻身世界研究生教育规模前列,奠定了从“大”到“强”的体量基础。首先,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显著扩大。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招生人数从最初的10708人增长至2024年的135.68万人,其中博士生17.11万人,硕士生118.57万人<sup>[9]</sup>。在不到五十年间,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了约127倍。其次,在学研究生规模同样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12年,我国在学研究生共计171.98万人,其中博士生28.38万人<sup>[10]</sup>;2024年,在学研究生总数已达到409.54万人,其中博士生67.63万人<sup>[9]</sup>,规模实现翻番。最后,毕业生规模稳步扩大。2024年,全国共有108.36万名研究生完成学业,其中博士生9.72万人,硕士生98.64万人<sup>[9]</sup>。据统计,新时代以来我国累计培养博士研究生超过90万人、硕士研究生超过900万人<sup>[11]</sup>,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规模庞大的人才资源。研究生总体规模的持续扩大,不仅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储备了雄厚的人力资本,而且为应对复杂挑战、开展大科学工程攻关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持。在规模扩大的同时,研究生教育正从外延式扩张阶段逐步向内涵式发展阶段转变。2020年以来,研究生招生规模增长速度整体有所放缓,但招生结构持续优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占比不断提高。2024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占比已达68.99%,已提前实现《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设定的“十四五”末期目标。这种结构性优化调整,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正在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为培养更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 2. 研究生教育学科体系日趋完备

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体系是其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与载体。经过四十余年

的持续建设,我国已形成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类型多样的研究生学科专业体系,为国家战略实施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科支撑。1981年国务院批准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初步确立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等10个学科门类。此后,学科体系逐步扩展,相继增设了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等门类,形成涵盖13个学科门类的基本框架。2020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印发通知,增设“交叉学科”作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以下简称新版《目录》),共设置117个一级学科、67个专业学位类别,基本覆盖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领域。新版《目录》将“交叉学科”作为独立门类正式纳入,下设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国家安全学等7个一级学科,并设置了文物、密码两个专业学位类别<sup>[12]</sup>。这一制度性突破,从体制机制上明确了交叉学科的合法性地位,为新兴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与知识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截至2025年6月30日,全国已有280所高校自主设置了总计1011个交叉学科<sup>[13]</sup>,涵盖人工智能、储能科学与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等前沿方向,有力支撑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 3. 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分类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多元化,我国研究生教育构建了学术型与应用型并重的培养体系。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格局基本形成。这一格局不仅优化了教育资源分配,更有效对接了国家战略与市场需求。《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从国家政策层面确立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战略定位、内涵特征与发展要求。新版《目录》首次将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纳入统一的学科专业目录,专业学位类别数量由47种增加到67种<sup>[12]</sup>。这个制度设计改变了以往专业学位作为学科目录附表的呈现方式,从根本上确立了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的同等地位。2023年11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首次将“分类发展”明确为政策的核心主题,进一步强化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在定位、标准、招生、培养、评价、师资等环节的差异化要求<sup>[14]</sup>。在研究生教育实践中,分类发展体现为规模与结构的显著优化。2012年至2022

年,专业学位授权点占学位授权点总数的比例从37.6%提升至44.2%,专业学位授予人数占比从32.29%上升至56.4%<sup>[15]</sup>。在新版《目录》中,博士学位类别数量较旧版增加177%;在博士生招生计划分配上,2022年专业学位博士的招生数量比5年前增加了8倍<sup>[16]</sup>。推动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已成为共识并付诸实践,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实现了从单一学术型培养向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并重发展的历史性转变,为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层次创新人才提供了制度保障。

#### 4. 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逐渐深化

新时代以来的持续改革为“十五五”时期研究生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积累了宝贵的政策资源与改革动能。首先,以“破五唯”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改革,为构建科学、多元的教育评价体系创造了条件。《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sup>[17]</sup>“破五唯”理念已逐步转化为高校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环节的具体实践,推动研究生教育评价从单一量化评价向质量与贡献并重转变。其次,育人机制改革不断深化,积累了丰富的内涵式发展经验。《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强调,“探索建立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培养分类发展、融通创新机制”“激发科教融汇活力,激活产教融合动能”<sup>[18]</sup>。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科教融汇与产教融合已成为提升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关键路径。一批高水平创新平台、产教融合基地、未来技术学院等相继建立,在打破高校与社会壁垒、推动真问题进课堂、真课题进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最后,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国家逐步下放管理权限,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例如,下放博士生导师审批权,在学科专业设置、学位授权点调整等方面赋予培养单位更多自主权,并强化省级统筹职能<sup>[19]</sup>。这些举措有效激发了高校的办学活力与内生动力,为研究生教育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提供了治理支撑。

### (二)“十五五”时期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挑战

#### 1. 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同质化严重

在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持续扩张的背景下,学

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虽已成为政策共识,但二者在实践中仍明显存在“形分类而未实分”的同质化问题。许多培养单位尚未从根本上确立分类发展的理念,或是囿于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导师指导、论文评价等关键环节出现趋同现象<sup>[20]</sup>。具体而言,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本应以夯实理论基础、强化学术创新能力、开展原创性研究为核心目标。然而在实际培养中,其课程教学仍多停留于知识传授层面,科研训练与前沿科学问题的结合不够紧密,“科教融汇”的深度不足。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本应面向特定职业领域,突出实践应用与职业胜任力的培养。但现实中,其课程体系往往成为学术学位课程的“简化版”,校企协同的“产教融合”机制尚不健全,产业界实践导师参与不足,导致学生解决复杂产业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效果甚微。这种同质化倾向,既制约了学术学位研究生学术原创潜力的激发,使其难以适应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拔尖创新人才的迫切需要;也削弱了专业学位教育的职业导向与培养特色,难以有效回应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精准需求。

#### 2. 学科调整难以及时响应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调整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响应机制滞后,难以与国家战略需求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变化实现同步协调<sup>[21]</sup>。这种“供需结构错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在前瞻布局上,学科设置与未来产业和创新前沿之间存在“时间差”。面对“十五五”时期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明确要求,现有学科目录的调整周期较长、审批流程复杂,导致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信息等前沿交叉领域的人才培养布局相对迟缓,难以敏锐预见并及时响应未来5至10年的人才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能力。第二,在动态适应上,学科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存在“节奏差”。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关键阶段。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科技创新、数据要素与绿色低碳技术等正深刻重塑产业生态。然而,部分高校的学科专业体系仍带有传统工业化时期的烙印,课程内容更新缓慢,未能及时将产业一线的技术变革与模式创新融入培养方案,导致部分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素养与实际

市场需求脱节,某些领域出现“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第三,在协同机制上,学科调整与市场需求信号之间存在“传导壁垒”。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有赖于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尽管政策层面强调产教协同,但高校、政府与产业界之间尚未建立起高效畅通的信息共享与反馈机制。研究生培养单位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响应能力和敏锐度相对不足<sup>[22]</sup>,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动态变化未能及时、精准地转化为学科优化、课程更新与培养模式创新的依据,导致学科专业的“供给侧”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侧”变化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进而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动能的有效转换。

### 3. 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不足

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是我国研究生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深层次挑战。满足拔尖创新人才全面发展的需要,是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sup>[23]</sup>。然而,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仍存在人才培养规模与质量不协调的结构性矛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提升基础学科创新能力、增强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能力、彰显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效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待解难题<sup>[24]</sup>。在培养模式方面,研究生教育尚未完全摆脱知识灌输的传统路径,对批判性思维、跨学科整合能力及非认知素养的系统培育仍显不足。课程体系设置往往刚性较强而弹性不足,限制了学生自主探索与试错的空间;同时,导师制度仍以“单一导师制”为主,跨学科、跨机构的导师组协同指导机制尚未普遍建立,制约了学生学术视野的拓展与交叉创新能力的发展。在科研训练环节,研究生科研活动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衔接不够紧密,许多研究仍停留在跟踪国际热点或局部改进层面,缺乏围绕“卡脖子”技术难题和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开展长期、有组织科研的系统布局,导致研究生在科研攻坚中锤炼颠覆性创新能力的机会不足。在评价与激励机制方面,“五唯”评价惯性短期内难以彻底扭转。当前评价体系仍偏重量化指标与短期成效,易催生“短平快”式成果,不利于引导师生投身周期长、风险高、意义重大的基础研究,挫伤了“十年磨一剑”的潜心探索精神,而这正是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关键土壤。在科教融汇与产教融合层面,高校内部的科研优势尚未充分、系统地转化为育人资源,科研设施、项目及成果向教学资源的转化通道不畅;同时,产学研合作仍多停留在项目

式、短期化阶段,尚未形成“需求共担、资源共建、过程共管、成果共享”的深度融合生态,使得研究生在真实、复杂的工程与产业问题中提升创新实践能力的机会不足。

### 4. 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不够

科技成果转化是将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与社会服务的关键环节,也是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sup>[25]</sup>。我国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众多研究成果多停留在论文与专利阶段,未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有效专利产业化率分别仅为3.5%和14.3%,远低于企业的49.3%<sup>[26]</sup>。可见,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所产出的科研成果,对国家战略需求的支撑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存在明显的“供给—需求”转化壁垒。首先,在科研成果的导向上,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研究方向与国家亟待突破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及重大原始创新需求衔接不足。部分研究仍局限于学术追踪或学科内部的理论推演,未能充分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导致研究成果在解决关键领域实际问题上的针对性和应用性不强,难以转化为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有效供给。其次,成果形态与转化机制之间存在脱节。研究生教育成果评价体系偏重于学术论文发表,而对技术专利、行业标准、解决方案等更具应用价值的成果形态重视不足、激励有限。同时,高校内部技术转移体系和服务能力相对薄弱,缺乏高效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平台,难以跨越从“技术原型”到“产品产业化”的“死亡之谷”。最后,在科研组织模式上,传统的以单一导师和个体研究为主的模式难以适应重大复杂问题所需的跨学科、大团队协同攻关要求。这种相对孤立的科研组织形式,既限制了研究的规模与深度,也使研究生难以融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导致其研究贡献往往呈现碎片化特征,难以形成集成优势,制约了其对国家整体技术攻坚的实质贡献。

## 三、“十五五”时期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推进策略

### (一) 破解“分类发展困境”:构建科教融汇与产教融合双轮驱动的分类培养体系

破解当前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存在的同质化问题,关键在于推动二者从政策宣示与形

式区分,走向培养全要素、全过程的实质性分类,系统构建“科教融汇”与“产教融合”双轮驱动的分类培养链条<sup>[27]</sup>。首先,应在培养目标与标准上确立根本分野。学术学位应坚持以培养从事原创性基础研究的“未来学者”为方向,注重提升学生的学术志趣、理论创新能力与学科前沿洞察力,其评价应突出科研成果的学术原创性与科学前沿贡献。专业学位则须明确以培养具备复杂问题解决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与卓越职业胜任力的“行业精英”为目标,其评价应侧重技术应用价值、实践创新成果及其对产业发展的实际推动作用。其次,推进课程教学、导师指导与学位论文等关键环节的范式重构。在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方面,应强化前沿讲座、专题研讨与高水平学术写作训练,深化科教融汇,推动学生深度参与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方面,需构建以真实案例、项目驱动与实践模块为核心的课程体系,积极推进校企共建课程、共组导师团队,其学位论文应聚焦行业实际难题,鼓励采用调研报告、规划设计、产品开发、案例分析等多样化形式。最后,深化体制机制配套改革,为分类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教育行政部门应赋予高校在分类评价与资源调配方面更大自主权,建立契合两类学位特点的师资评聘、考核与激励机制,尤其要提升产业导师的地位与实质性参与度。同时,健全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认证的衔接机制,增强其社会认可度与职业发展支持。通过以上系统性、深层次的改革,逐步打破当前同质化培养的路径依赖,推动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特色培育,共同构成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高质量、差异化高层次人才供给体系。

### (二)破解“供需结构错配”:建立学科专业动态调整的快速响应机制

破解当前研究生教育存在的“供需结构错配”问题,必须超越传统学科专业设置的固化模式,构建一套能够敏锐响应甚至前瞻引领国家战略与市场变化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快速响应机制。该机制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在于打通信息壁垒、下放管理权限、强化制度协同。首先,建立多维度、前瞻性的需求预警系统。教育主管部门应联合科技、工信、人社等部门,建立健全数据共享与会商机制,依托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产业规划及人才需求预测报告的大数据分析,科学研判未来5—10年高层次人才的数量结构、类型分布与能力要求,定期发布《优先发展学科专业清单》与《预警专业清单》,为高校学科专

业布局提供前瞻性指引,推动学科设置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引领”转变。其次,深化“放管服”改革,赋予高校更大的学科设置自主权。激发基层培养单位在学科结构调整中的积极性,是灵活应对产业与就业结构变化的关键<sup>[28]</sup>。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可简化或实施备案制,以此管理新兴交叉学科的设立程序,支持高校围绕国家急需领域与自身办学特色,快速响应并设立前沿技术学院、交叉学科学位点;同步探索“学科专业设置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清单之外充分放权,激活基层学术组织自我优化的内生动力。再次,强化资源配置的引导与激励功能。财政拨款、招生计划等资源应重点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养成效显著的优势学科与专业学位领域倾斜,形成“扶优扶强、动态调整”的资源配置机制,推动学科结构持续优化。最后,构建政府宏观统筹、高校自主负责、行业企业深度参与、第三方评估认证的协同治理新格局。通过多主体协同、制度化反馈与动态化调整,推动研究生教育的人才供给结构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动态需求持续精准匹配,从而形成供需联动的良性发展生态。

### (三)破解“人才培养瓶颈”:系统重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生态体系

提升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关键在于超越对局部培养环节的“零敲碎打”,从系统性、生态性视角出发,整体重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生态体系。该体系重构涵盖价值理念、培养模式、评价机制与育人生态四个层面,旨在形成合力,推动人才培养质量实现根本性提升。首先,推动价值理念的深层转向。应将批判性思维、原始创新意识以及包括坚毅品格、学术抱负在内的非认知素养置于培养核心,推动教育价值观从“工具性塑造”向“整体性育人”转型,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奠定价值基石。其次,深化培养模式的系统变革。着力打破学科壁垒与制度藩篱,大力推行以重大科学问题与真实项目为牵引的“科研主导”培养模式。在博士生教育中,尤其应深化科教融汇,推动学生进入国家重点实验室、前沿科学中心等平台,在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的实践中锤炼创新能力。全面优化导师制度,建立跨学科导师组,积极推行“师生相长”的学术共同体文化,并引入产业导师,通过深度产教融合为学生提供多元实践视角与创新资源。再次,建立长周期、鼓励探索的评价机制。构建重视学术志趣、创新潜质、过程表现及实际贡献的评价体系,宽容失败、鼓励潜

心钻研,为“十年磨一剑”的原始创新营造宽松、包容的制度环境。最后,构建开放协同的育人生态系统。对内激活高校跨学科、跨平台的内部协同动力,对外深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并加强与国际一流学术网络的互动,形成内通外联、资源汇聚、动态开放的支撑生态。通过理念、模式、评价与生态的协同重构,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涌现培育丰厚土壤,系统提升我国在高层次人才领域的自主培养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 (四)破解“科研转化低效”: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长效机制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诉求在于构建一套由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应用组成的全链条自主创新体系,系统破解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的错配问题<sup>[29]</sup>。提升研究生教育的科研转化效能,使其更有效地支撑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急需打破高校、产业与用户之间的体制机制壁垒,构建以信任为基础、以利益为纽带、以长效为目标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新机制。首先,推动科研范式从“论文导向”向“问题导向”转变。引导研究生教育从追逐学术热点的“锦标赛”模式转向响应国家战略需求的“应答”模式。高校需主动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业前沿“卡脖子”技术及社会治理中的复杂现实问题,凝练为研究生的核心研究课题,确保科研选题源于实践,从源头保障研究成果的应用潜力和转化价值。其次,打造实体化、高能级的协同创新平台。改革传统的松散、短期的项目合作形式,重点支持建设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于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未来技术学院及卓越工程师学院。全面推行“双导师制”或“跨学科导师组制”,聘请企业顶尖专家担任实践导师;课程体系与科研训练应由校企双方共同设计、实施,推动学生深度参与从技术构思、研发到中试验证的全链条创新过程,在实践中锤炼解决复杂工程与产业问题的能力。再次,深化评价体系与利益分配机制改革。在学位授予、导师评聘、学科评估等环节提升专利转化、技术解决方案、标准制定等应用型成果的权重。同时,建立清晰、可操作的知识产权归属与利益共享机制,有效激发高校、企业及科研人员深度参与协同创新的内生动力。最后,构建需求牵引、协同攻关、应用反馈、迭代创新的闭环创新生态系统。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动研究生教育不仅能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更能直接服务于产业技术革新与核心竞争力提升,使之成为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支点。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N]. 中国教育报,2020-07-30(01).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EB/OL]. (2024-07-21). [http://www.scio.gov.cn/zd gz/jj/202407/t20240722\\_855895.html](http://www.scio.gov.cn/zd gz/jj/202407/t20240722_855895.html).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EB/OL]. (2025-10-28).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510/t20251028\\_1418317.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510/t20251028_1418317.html).
- [4] 汪旭晖,李晶. 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体系:科学内涵、发展困境与实践进路[J]. 教育与考试,2025(1):53-64.
- [5] 翁铁慧. 切实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更好发挥加快建成教育强国的龙头牵引作用[J]. 思想理论教育,2024(10):4-7.
- [6] 马永红. 促进数智时代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J]. 教育发展研究,2024(19):3.
- [7] 马永红,张飞龙. 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脉络及时代意蕴[J]. 民族教育研究,2022(1):15-22.
- [8] 张君凯,王嫣. 面向2035年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及教育资源供需缺口预测[J]. 教育经济评论,2025(4):18-35.
-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5-06-11).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506/t20250611\\_1193760.html](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2506/t20250611_1193760.html).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13-08-16).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s180/moe\\_633/201308/t20130816\\_155798.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s180/moe_633/201308/t20130816_155798.html).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加快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EB/OL]. (2024-10-23).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2024/2024\\_zl13/202410/t20241023\\_1158823.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2024/2024_zl13/202410/t20241023_1158823.html).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的通知[EB/OL]. (2022-09-13).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33/202209/t20220914\\_660828.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33/202209/t20220914_660828.html).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名单[EB/OL]. (2025-10-11). [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202510/t20251011\\_1416327.html](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202510/t20251011_1416327.html).
-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EB/OL].

- OL]. (2023-11-24).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2/content\\_6922068.htm](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2/content_6922068.htm).
-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我国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专业学位授予人数占比达 56.4%[EB/OL]. (2023-12-19).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3/55658/mtbd/202312/t20231219\\_1095310.html](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3/55658/mtbd/202312/t20231219_1095310.html).
- [16] 我国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 进一步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比例[N]. 人民日报, 2023-12-21(15).
-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EB/OL]. (2020-10-13).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010/t20201013\\_494381.html](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2010/t20201013_494381.html).
- [18] 新华社.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EB/OL]. (2024-10-20). <https://www.news.cn/20241020/abaf a3be29f445efb2a84cde5300c096/c.html>.
- [19] 赵世奎, 杜佳卉, 吴彬. 完善超大规模治理体系 提升博士生教育全球竞争力[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5(4):65-70, 144.
- [20] 王战军, 李旖旎.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关键问题与推进策略[J]. 中国高等教育, 2024(5):30-34.
- [21] 聂飞, 姜华, 林恺, 等. 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校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及关键路径[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5(5):85-92.
- [22] 赵军, 陈佳钰, 李博. 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实证研究[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5(1):1-10.
- [23] 郭月兰, 汪霞. 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逻辑与实践取向[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9(2):6-11.
- [24] 包水梅, 王琦, 丁洁. 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政策:价值旨归、风险防控、实践路径[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5(2):28-37.
- [25] 蔡三发. 研究型大学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实践探索[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5(7):36-43.
- [26] 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EB/OL]. (2023-01-03). <https://www.cnipa.gov.cn/attach/0/08361b2a6aef417cbe102f7d77f1f851.pdf>.
- [27] 贺祖斌, 周润伍. 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逻辑、价值与路径[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5(3):44-51.
- [28] 王顶明, 杨佳乐, 黄颖. 我国研究生教育结构的现状、问题与优化策略[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9(2):1-5.
- [29] 史秋衡. 以科教融汇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5(7):44-53.

##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Era Demands, Realistic Founda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ZHENG Gang, FU Yan

(School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bears the mission of serv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drive, meets the innovation demands of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responds to the reform requirements of building a postgraduate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world-class standards. Currently, the scale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discipline system is increasingly complete, the classific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of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degrees has initially taken shape, and comprehensive reforms are constantly deepening.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everal issues i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such as the homogenization of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degree training, the inability of discipline and major settings to fully meet the deman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urgent need to improve the system for cultivat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and the need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Facing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requires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classified training, improving the dynamic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disciplines and majors, innovating the model for cultivating top-notch talents, and perfecting the mechanism for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cademia,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thereby injecting lasting impetus into the accelerated construction of an education power,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wer, and a talent power.

**Keyword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postgraduate educ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ultivation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